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
B1-B4
四明周刊
2021年3月23日 星期二
视点 | B1
责任编辑/顾 玮
电子信箱/gw@cnnb.com.cn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以其特有的形式、结构、材料和营造工艺，承载历史，见证文明。

位于宁波北郊的保国寺大殿，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现存早期木构建筑遗产，不仅代表了江南海道辐辏之地千年的文化高度，而且彰显了东方古老国度厚重的艺术风范，在建筑史、艺术史、科技史上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年3月4日，是保国寺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60周年纪念日，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推出了“国宝伴您60年”系列文化惠民活动，与先期启动的“保国寺北宋大殿实证建模系列科研项目”一起，以全新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建筑文化遗产，并以此促进传统营造技艺的薪火传承。

木构重辉：解码保国寺千年大殿文化基因

陈青 张璐易

风华宁波 宁波建城1200周年

宁波第一“国保”迎来一甲子

灵山环抱、古木掩映，重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的保国寺大殿，历经千年沧桑，仍然保存了当时的形制结构和主要构件，被誉为“江南一绝”。“星斗昂拱，结构甚奇，为四明诸刹之冠”，以此描述它大概最恰当不过了。

1954年，保国寺北宋大殿被意外发现，改变了当时国内建筑史学界普遍认为长江以南地区不可能留有宋代早期建筑遗存的学术观点，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筑史学研究领域的一次重大发现。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建筑为主，由于木结构建筑不易保存的特点，目前唐宋元时代的遗存数量较少，尤其是南方地区，由于潮湿和虫害，木构建筑更是稀缺。现存唐宋辽金时期木构，绝大多数存留于北方，约70%在山西省。而南方地区宋代木构只有两处，一是福州的华林寺大殿，一是保国寺大殿。比较之下，保国寺大殿保存得相对较好，可以说是江南地区保存最早和最完整的一座木构建筑。

保国寺大殿所反映的木构营建理念以及诸多工艺手法，与《营造法式》的记载如出一辙，被视作印证《营造法式》北宋官式建筑的“活标本”。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学生、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原组长罗哲文曾这样评价保国寺大殿：“江南古刹、文物精华、法式例证、建史奇葩”。

1961年3月4日，保国寺与故宫、长城、佛光寺、布达拉宫等一并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已整整一个甲子。

这是宁波第一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一代代文保人守护着这座千年古建，用心血汗水延续着它的不老神话。

近年来，随着修缮养护等文保工程的实际需求，保国寺大殿营造技艺的保护传承愈发显得重要，成为大殿“延年益寿”的必要技能。相关非遗传承人依据大殿保存现状，与清华、东南、同济等国内知名高校合作开展学术研究，结合历次修缮发现和多年监测成果，细致推敲大殿之中古代匠师的匠心独运，逐步推演出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古建营造工艺流程。

天一阁博物院（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木构营造研究所负责人曾楠说，保国寺成为“国保”60周年，又适逢宁波建城1200周年，此时启动保国寺北宋大殿实证建模系列科研项目，不仅印证了以保国寺大殿为代表的传统木构营造的技术领先性和科学优越性，而且将促进保国寺大殿学术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是保国寺“十四五”文博事业的发端，也是对浙江文化基因解码工程的响应。

保国寺大殿内景

模型搭建现场（汤丹文 摄）

探究大殿千年留存的木构密码

宋代，中国古建技术发展到成熟时期。宋代建筑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科技含量也达到了顶峰，《营造法式》就诞生在这个黄金时代。

在保国寺大殿建成90年后，《营造法式》问世。这是由官方颁布、全国发行的带有建筑法规性质、中国古籍中最完备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集中反映了以北宋都城汴梁为代表的北方官式建筑的营缮制度和做法，又与江南木构营造有很多关联，被梁思成视作我国木构建筑的“文法课本”。

保国寺大殿在诸多方面与《营造法式》关联一致，是现存遗构中最接近法式制度者。曾楠认为，在对法式的深入研究中，保国寺大殿更显特殊意义和价值，是分析和拆解《营造法式》中南方技术因素的最重要的实物线索和参照例证。

经过多次实地勘测，大殿东次间前进梁架共计被拆分为217个单体构件，最大的长达4米，最小的仅有手掌大小。尽管这批构件占比不到大殿全部木构的十分之一，却几乎囊括了大殿与《营造法式》相互印证的构件实例和做法，比如小材大用的拼合柱、符合规制的材分等第、领先世界的断面比例、海内孤例的虾须拱、科学合理的开榫打卯、造型古朴的月梁阑额等。

保国寺营造技艺自北宋大殿重建以来已承续千年，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它以当地木材和经由海上运输而来的东亚地区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运用锯、斧、刨、凿、锤等传统木工工具，以榫卯为主要连接方式，以材分模数制为尺度设计和加工生产标准，体现了浙东地域建筑文化与我国北方中原地区传统建筑文化的融合，是宁波历代工匠集体创造的经验总结和匠心智慧的结晶。

遵循“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的原则，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宁波本地工匠，在制作前严格考究，花费月余时间，完成217个构件的精确三维模型，绘制全尺寸构件图纸150余幅。今年春节后，大殿东次间前进梁架1：2实木模型搭建终于完工。3月4日，模型搭建过程以延时摄影的方式向大众作了展示，引起不俗反响。

此次1：2实木模型搭建，依托保国寺营造技艺这一宁波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遗保护传承中研究深化其内涵，不仅探究了大殿千年留存的木构密码，也为今后保国寺文保修缮储备了一批既懂技术又能研究，还了解现代文物保护手段的复合型非遗传承人。

保国寺大殿不是一蹴而就的，古人在传承中营建、在营建中向前发展，成就了千年的智慧结晶。保国寺文保人正循着古人留下的印痕，揣摩着他们的匠心匠意，在守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回溯古人走过的路。

11世纪初最先进的木构技术

保国寺大殿作为建造年代较为明确的早期江南木构建筑实例，其承上启下的技术特征，在建筑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构件的造型，瓜楞做法是古代江南地区较为普遍的一个特色。《营造法式》卷三十合柱鼓卯图中对两段合和三段合拼柱做法的图样记载是已知现存最早的有关瓜楞的文献。现存的江南五代和两宋遗构中，仿木的砖石瓜楞造型较多，但木构建筑仅保国寺大殿一例。

保国寺大殿面阔和进深各3间，内柱4根，檐柱12根，共计16根柱，都采用了瓜楞柱的形式。最特殊的当属中心的四根拼合瓜楞柱——以中心四段合小柱承重，外围镶嵌四瓣装饰，形成外观八瓣的瓜楞柱造型。天一阁博物院（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木构营造研究所滕启城说，这种做法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以小拼大，并在坚固、适用的基础上兼具审美艺术效果。“瓜瓣造型同时体现在柱上的栌斗中，二者对应关联，形成一体，是保国寺大殿瓜楞造型的独特形式，也是现存遗构中的唯一案例。正是这对应关系，证明了现存的瓜楞柱形式是宋代建造大殿时的特征。”

“远看屋顶，近看斗拱”。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有特色和最为醒目的构件，在美学和结构上拥有独特的风格。因为斗拱的存在，中国古典建筑的屋顶得以出檐深远、呼之欲出。保国寺大殿斗拱硕大，主要布置在外檐、内檐、天花装修等处，共计20种，依据所处的位置不同变幻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了斗拱各部件的力学性能。

走进保国寺大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个造型古朴精美的藻井，位于两侧的小藻井角部就使用了虾须拱，且采用了法式“鼓卯到心”的做法，在天花板平棊的四角也是使用了虾须拱。这类极罕见的构造做法，体现着古代工匠灵活运用斗拱解决实际问题的创造才能，为海内孤例。

大殿斗拱用材断面高宽比为3：2，根据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科学家汤姆士·扬的研究，这样的比例反映了最高的出材率，具有最理想的受力效果。中国工匠所采用的受力构件，要先于汤姆士·扬的实验数据几百年，而且作为北宋建筑的官方标准，早已成为一种法式制度，领先世界。

保国寺大殿斗拱的精巧构造特征与《营造法式》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表明其营造技艺代表了11世纪初最先进的木构技术，不仅指导了中国木构建筑的发展，在世界建筑科学史上也闪烁着光辉。

气势宏伟的木构大殿，没有使用一根铁钉，全部靠精巧的榫卯技术将各个构件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承托起重50余吨的屋顶，在江南多雨潮湿、台风肆虐的环境中走过了1000多个春秋。

保国寺大殿的榫卯技术中，镊口鼓卯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燕尾榫形式，用以连接柱额和柱串。滕启城说，一般的燕尾榫做法，是在柱子上做卯眼，梁上做榫头，保国寺大殿镊口鼓卯的做法是反过来的，是目前已知为数不多的遗构中最早的一个案例。“田野调查中也很少见到这种做法，很好地证实了‘镊口鼓卯’是一种极具南方特色的榫卯形式，这也是研究《营造法式》南方因素的一个重要线索。”

保国寺大殿另一个较为特殊的榫卯做法是西侧顺栿串插入内柱后，采用过柱穿榫加销的做法。这也是河姆渡时期干栏式建筑的基本榫卯类型之一。滕启城介绍，这种做法并没有在早期江南木构中广泛流行，建造年代较早的保国寺大殿中的这一典型榫卯案例，也极有可能是《营造法式》侧样柱梁连接用榫卯形式的源头。

滕启城感叹，榫卯工艺融合了古代传统力学、美学智慧，帮助建筑抵御外部荷载冲击，历经千年不倒。保国寺大殿中应用的特殊榫卯节点，蕴含了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思想，是极具地域特色的营造技艺的独特创造，不仅为通行全国的《营造法式》提供了借鉴，丰富了我国古代建筑营造技艺，也展示了传统木作艺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照片除署名外，由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提供）

经典的原乡

徐建成

河海交汇，宁波真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城市，有很多名家藏身其中，你可能不曾特意关注过他们，但只要一提到，就会令人吃惊不小。

几天前，我去了慈溪观海卫镇的蒋家村，考察了一座名家学者的故居。殊不知这位名家就是大仲马经典名著《基度山伯爵》的中译本译者蒋学模先生，这部1949年的中译本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回到家后，翻阅书柜中的这部经典，一看译著者果然是蒋先生，不由得惊叹。

其实，在回程的路上，车驶过龙山镇林家村，那里也走出了一位翻译名家林汉达，而且故居也保存着。他翻译的经典名著是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到达江北岸时，董乐山的名字又掠过脑海。他是斯诺《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的译者，他译著的这部经典被公认为是最忠实于斯诺原著的版本。

有人说，翻译是一个“渡”，翻译家就是取经者，是人类精神的传递者。在没有数字化技术手段的年代里，可曾想过，这些名家译者是怎样独坐书台、挑灯夜战，付出自己青春才华，倾注几番思想心血。

这里还要提到两位宁波籍翻译大家。一位是宁海力洋的叶水夫，我国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中国译协会长、《世界文学》杂志主编。他翻译的作品是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的代表作、脍炙人口的《青年近卫军》；另一位是镇海骆驼的草婴（盛峻峰），中国译协副会长，也是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他系统地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作品，包括3个长篇、60多个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其中《安娜·卡列尼娜》在读者中影响力最大，当然还有著名的《战争与和平》。为此，他被俄罗斯授予“高尔基勋章”和“俄罗斯荣誉作家”称号。

说到高尔基，就会想到《海燕》，你不会想到中学语文课本里的这个名篇也是宁波人翻译的吧？的确如此，它也是宁波作家翻译的，影响了几代人，译者的名字叫施其南，宁海人。

当然，北仑大碶横河小李家村也走出了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李俍民，一部《牛虻》成了他译著的“最强音”。20世纪50年代《牛虻》译著出版后，在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中引起了轰动。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牛虻》更是成了鼓舞志愿军战士奋勇杀敌的精神动力。

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位，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原名陈蕴珍，鄞县人。她与巴金先生一起合译了经典名著普希金的《黑桃皇后》，以及《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

除了上述几位译者，还有其他已知的，或未知的。已知的有：鄞县人施咸荣，由他主持翻译出版的名著是《莎士比亚全集》；鄞县人包文棣，他几近失明，却以坚强的意志力翻译完成了别林斯基的作品。这些翻译家有着精彩的人生广度和厚度，何尝不是宁波文化独特之“书香”现象，期待人们的阅读呢？

突然发现，经典其实并不遥远，就在我生活着、工作着的这座城市里，这片港湾就应该是原乡。若没有这些翻译家的再度文学创作，何来经典装入我的脑袋、丰富我的精神世界呢？

宁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这里既是起航的始点，更是登陆的终点。河海交汇处，原本引人瞩目的是物质文明的交通贸易，如今发现精神文明的交往也同样丰厚。在笔者心中，似有一艘海船驶来，它载着异国的文学经典而来，也装着中国的经典文学而去。

各种版本的《基度山伯爵》（王晓莉 摄）